

司法界人际网络与近代法院运作

——基于《沈锡庆日记》的考察

姜 增*

摘 要:《沈锡庆日记》完整记录了绍兴人沈锡庆 1932 年 1 月到 1935 年 4 月担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内容。沈锡庆所在的司法界,正处于关系本位文化与新式人际资源交融之时。他的此段任期,也正好处在“梁启超立宪派司法”向“居正辛亥派司法”的过渡时段。任职上海地方法院期间,沈氏司法界的人际网络呈现交游广泛、新旧夹杂、差序格局、女性角色缺失等特质。沈氏个人人际网络的这些特质,实涵盖了其时司法界人际网络的共通要素,反映司法界社会交游的基本样态。以人事与经费为例,沈氏司法界的人际网络,隐现于上海地方法院的运作之中。近代司法建设中所产生的问题及其缘由,或可从人际网络对于司法的异化视角去审思。

关键词:《沈锡庆日记》 人际网络 派系 关系本位

* 姜增,绍兴文理学院法律系讲师。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北京政府时期地方司法行政‘双轨制’研究(1912—1927)”(18CZS044)的阶段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

法院,作为独立行使审判权以实现公平正义的国家司法机关,在近代中国属舶来品。近代中国法院^①的建设,总体上以西方(包括日本)为效仿的对象,并与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目标息息相关,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激起波澜,引来了中外人士孜孜不倦的评断。^② 势转时移,这样的评断一直持续到现在。特别是近几年,随着对档案史料的开发利用,

① 近代中国的审判机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称呼。北洋政府时期,在地方名为审判厅,最高审判机构名为大理院。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有司法处、法院等名称。因审判厅、大理院作为审判机构,与法院只是名称互异,实质其同。所以,为行文的方便,后文将以法院统一名之。

② 1949年之前对法院的研究与关注,并未有专书出现,而只是一些零散的文章之类。与本文所涉上海地区的法院的研究相关者,当以对上海特殊之法院的研究为首。如梁鑒立:《美国驻华法庭之组织及将来》,载《法学季刊(上海)》1924年第1卷第9期;陆鼎揆:《上海临时法院》,载《太平导报》1927年第2卷第1期;严绂葳:《上海之会审公廨与临时法院》,载《新纪元周报》1929年第1卷第10期;Hawking Yen, *The Shanghai Provisional Court: Past and Present*, Pacific Affairs, Vol. 3:3, p. 294-298(1930);钱泰:《上海特区法院成立之回顾》,载《中华法学杂志》1930年第1卷第3期;纪刚:《上海特区法院之解剖》,载《中央导报》1940年第1卷第13期;金雄白:《上海特区法院的形成和接收的必要》,载《中央周报》1940年第7期;等等。

关于近代法院的研究,出现了诸多优秀的学术作品。^① 这些学术著作所涉法院,涵盖了从最高法院到基层法院的层级;写作内容上,包括了司法审判与司法行政的诸多方面。得益于学界诸贤的努力,近代法院的研究被推向了更加细致与精致的层面。

但在当下的研究面向上,似仍存有一定的缺憾。其中的缺憾之一,便是缺乏对法院活动之中的“人”的因素和司法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即人际网络的关注。即便有关注,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当下对于近代法院的研究,虽也会在形式上对于对院内的“人”有所论述,如根据档案史料,将某一时期的法院职工等人事状况描绘出来,并对其中的部分职员进行生平履历式的介绍。但这显得静态与平面化,对于司法官群体以及司法官群体之间的人际网络等动态与立体面向,却鲜有涉及。^② 李在全对于近代司法中的“人”的因素——司法官,进行了集中的研究与关注,并有诸多单篇论文成果问世,

① 相关的研究著作,可见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年版;Xu Xiaqun, *Trial of Modernity: Judicial Reform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a, 1901-193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徐小群:《现代性的磨难:20 世纪初期中国的司法改革(1901—1937)》,杨明、冯申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2018 年版];汪世荣等:《新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石: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1937—1949)》,商务印书馆 2011 年版;姚远:《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韩涛:《晚清大理院:中国最早的最高法院》,法律出版社 2012 年版;唐华彭:《镇江地方法院研究(1928—1949)》,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李洋:《美国驻华法院研究(1906—1943)》,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陈翠玉:《江北县地方法院司法审判研究(1927—1949)》,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6 年版;侯欣一:《创制、运行与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洪佳期:《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审判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8 年版;谢志民:《民国时期江西县司法处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国吉亮太「東省特別区域法院について:中華民国北洋政府期司法制度改革の一断面」九大学法 116 号(2018 年);等等。

② 参见唐华彭:《镇江地方法院研究(1928—1949)》,中国法制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81—102 页;侯欣一:《创制、运行与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商务印书馆 2017 年版。

这些论文近来已汇集成书。^① 并且李在全 2017 年度所申请得到国家课题,仍以司法官为研究对象,可以期待的是,对于近代司法官的探索将被进一步深化。^②

就司法官人际网络的研究,李著也有涉及,其主要是围绕《余绍宋日记》来展开论述,他的基本观点是近代司法界的人际网络多半是负面与晦暗的。^③ 然而,在李著的关注视域当中,人际网络只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并非是其论述中的主角。再加上可能是学科的不同,李在全对于司法官人际网络的研究大都是就人论人,即使对时代背景给予了充分关注,但却没有顾及承载这些人的司法机构,换言之,没有能将人际网络与法院活动进行有机结合。张仁善虽然依托司法中枢、法院等司法机构,为我们详细描摹了司法界的不良社会关系图景,但就主题内容的集中与深化以及资料的利用方面,似仍有进一步拓展的空间。^④ 相应的也有外文作品涉及

① 参见李在全:《变动时代的法律职业者:中国现代司法官个体与群体(1906—192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

② 20 世纪中国的政权鼎革与司法人员变动研究(1906—1956)(项目号:18AZS014)。

③ 李在全:《“断不可使法界亦卷入政治风潮”——1920 年代前期中国的司法生态》,载《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 年第 9 期;李在全:《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法律界的交游网络与职业意识——以余绍宋为中心》,载《史林》2017 年第 6 期。基于《余绍宋日记》与《沈锡庆日记》记主身份、内容侧重、所涉年代与地区以及研究论题等方面的不同,预示了下文研究《沈锡庆日记》自有其价值所在,这已在笔者另外一篇将要刊出的文章中提及,在此不再赘述。

④ 如张仁善在相关著作中,几乎将司法界各个角度的不良社会关系都有描绘,但没有做更加深入与精细化的探讨。而且在资料利用方面,较多运用 1949 年后各级政协所征集和发表的文史资料,章开沅曾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与此类资料的作者打过交道,他认为当时由于外在的压力和主观意识变化,每有可能导致回忆时不同程度的失真,无论溢恶或溢美之辞都会误导读者。参见张仁善:《一种法律社会史视角的考察——国民政府时期司法界不良社会关系剖析》,载《南京大学法律评论》第 19 卷,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版;张仁善:《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1928—194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288—365 页;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修订增补本),华文出版社 2010 年版,“序一”第 4 页。

中国近代司法官群体,但并未谈及人际网络这一面向。^①不过外文著作在厘清近代中国法律人的代际以及司法官的发展路向等方面,给予了笔者有益的启发。

为什么要在近代司法史的研究中关注人际网络?受西风东渐与固有文化的影响,近代以来的中国社会一方面努力进行以学缘(学校出身)、业缘(所从事的职业)、阶级(意识形态)等新式资源去构建“去传统”的人际关系的尝试,另一方面传统的如学缘(科举场上的同年同科或书院中的同门弟子)、血缘(或拟血缘)、地缘(乡缘)等旧有资源并未退居历史舞台的幕后。后者往往深深嵌入在新式人际关系当中,发挥其潜在的影响,与前者一起,交织成一个巨大复杂、相互缠绕的关系网络。^②具体到司法领域,因近世中国并未形成稳定有效的政治和法制的形态,加上社会的频繁变动,法院常常失却其独立个性,而变成一个司法界内部之间、司法界内外之间竞斗的利益场。此语境之下,以新旧混合为表征的人际网络往往乘机混入司法界,在司法官的任用、法院的经费获求、讼案的处理等方面产生重要影响。即使到现在,法官在他的关系网络中展开工作,人际关系对法院运作仍有有极大的影响。^③

可见,廓清与制度性资本相对的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人际网络为其重要构成之一^④)在法院的运作实态,

① Robert Culp, U. Eddy & Wen-hsin Yeh, *Knowledge Acts in Modern China: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6, p. 89-148.

② 参见许纪霖:《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知识分子交往网络》,载李长莉、左玉河主编:《近代中国社会与民间文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7 年版。

③ 参见徐清:《三重场域下中国基层司法官离职类型探讨》,载《法学》2018 年第 4 期。

④ 参见曹荣湘:《社会资本术语》,载曹荣湘选编:《走出囚徒困境——社会资本与制度分析》,上海三联书店 2003 年版。

应是近代司法史内容的组成部分,有其历史与现实意义。当下这样的一种研究缺憾,可能与缺乏特定的资料有关。相较于制度性构建的可见性,人际网络的挖掘则显得相对困难。因为人际网络往往是非常隐秘和复杂的。对于当下的学者,囿于年代隔离、资料缺少,特别是日记、书信等较为私密性的资料的缺少,而难以对当时的人际状况有所洞察,导致无法对司法界人际网络作深入的研究。

笔者有幸收集到20世纪30年代曾任职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沈锡庆的日记,^①可能会对资料的限制瓶颈有所突破。^②下文笔者将在学界以往的研究基础上,以《沈锡庆日记》为根据,在写作中更加突显“人”的因素,从人际网络的视角,追索沈氏任职上海地方法院期间,左右前后之层级之间的互动,从系统与动态的角度去审视近代法院的活动。本文的基本问题是,在当时的社会语境与网络的联结之下,以法院为活动场域的司法官,他们相互之间如何交往?交往又如何影响法院活动?如何影响司法界人际网络和生存空间的建构?

① 《沈锡庆日记》,现藏于绍兴图书馆,稿本,九册,十一行字不等,红格稿纸,四周单边,白口,版框18.5cm×13.5cm。日记起自1931年1月1日,迄于1935年12月20日,完全覆盖了其从调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到最后离任的时间段(1932年1月到1935年4月)。在任职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之前,部分涉及了其担任司法行政部参事以及短暂离开司法界的内容,以及在卸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之后的内容。目前《沈锡庆日记》已由绍兴文理学院高利华教授整理出版,收录于凤凰出版社“中国近现代稀见史料丛刊”系列。(沈锡庆:《沈锡庆日记》,高利华整理,凤凰出版社2019年版。)但鉴于整理版本有所错漏,本文仍在参照整理版本的基础上,直接引用绍兴图书馆馆藏的原版日记。

② 当下历史学界对于利用日记等材料对历史人物的人际网络等问题进行探究,已经有较为成熟的路径。但就一个法律人物展开的研究,除上述所言李在全对于余绍宋的研究之外,则似缺少其他有代表性的作品。史学界的相关的论著,见汪朝光编:《蒋介石的人际网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美]沈艾娣:《梦醒者:一位华北乡居者的人生》,赵妍杰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郑会欣:《日记中的历史:民国名人的公务与私情》,香港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等等。

最终对近代法院运行以及近代司法乃至中国的现代化之路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二〕沈锡庆与上海司法界

沈锡庆(1884—1936),字庆生,绍兴东浦人。其表叔为辛亥先烈、安庆起义带头人徐锡麟(1873—1907),沈锡庆对其革命事业有所襄助,辛亥革命成功后,他在绍兴的临时军政分府当中短暂担任过治安科科长一职。^①甲午战争后,留日渐成风尚,在此风潮之下,沈锡庆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五月由浙江自费赴日,先是入经纬学校普通科就读,未毕业,次年(1906年)八月正式入读早稻田大学法科,于宣统二年(1910年)五月二十八日获结业证(号1549)。^②毕业归国后,在20世纪30年代“重长上海地方法院”之前,其执教过法校,担任私立浙江法政专门学校第三班别班课民法总则讲师一职,之后便侧身司法界,辗转多地,历任浙江省、江苏省、湖南省等省高等审判厅推事及永嘉、吴县等处地方法院院长。^③1936年6月29日,也即其卸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一年后,因病逝世于绍兴东浦。^④

① 参见陈天成:《绍兴的临时军政分府》,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绍兴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绍兴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82页。

② 参见佚名编:《清末各省官费自费留日学生姓名表》,载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50辑,台湾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78年版,第125页;亦可参见高木理久夫,森美由纪「早稻田の清国留学——『早稻田大学中国留学生同窓録』の記録から」早稻田大学図書館紀要62号(2015年)55頁以下。

③ 参见民国绍兴县修志委员会辑:《浙江省绍兴县志资料第一辑》,民国二十六年(1938年)铅印本,《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38号,台湾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3234—3235页。

④ 参见《沈锡庆先生讣告》,载《新闻报》1936年7月5日,第6版。

(一) 沈锡庆的二进宫

沈锡庆的法律生涯相对纯粹,民国纪元以后的活动轨迹基本在司法界,直至1935年(去世前一年)才脱离。他的司法履历中,与上海司法界颇有缘分,曾先后两次履职上海地方审判机构长官。虽然两次都未善终,但从当时报纸的风向来看,对这位长官的人格与功绩还是颇多正面评价。

1923年,沈氏第一次调沪任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①此次调任,沈像是一名救火队员。在时任江苏高等审判厅厅长朱献文的令委之下,沈锡庆由原本的江苏吴县地方审判厅厅长任上调于此地,以应付原上海审判厅长梅诒谷弃职携眷潜逃所造成的沪厅群龙无首之状。^②1927年,因北伐军进入上海,在时局的混乱之中,沈氏差点丧生。^③这次的离任,实有被迫无奈的情形。沈氏也将这一年的经历视为是“大危难”。^④但也正是此次在上海的任职,使其感同身受近代上海司法界在列强环伺下的诸多特殊复杂的境况,^⑤他一些整顿厅务的做法也频频为报刊所载,这也是其在20世纪30年代能再一次任职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重要履历资本之一。

① 参见《沈锡庆调任沪审判厅长》,载《新闻报》1923年2月8日,第10版。

② 参见《审厅长梅诒谷弃职携眷潜逃》,载《申报》1923年1月18日,第13版;《地方审判厅长继任有人》,载《申报》1923年2月7日,第13版。

③ 孙绍康时任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对此事有记载,参见孙绍康:《五五回忆录》,出版社不详1941年版,第59页;《各机关消息》,载《申报》1927年3月23日,第9版。

④ 《沈锡庆日记》第一册,1931年6月15日,星期一。

⑤ 沈锡庆关于此点的感受可在外国官员参观上海地方审判厅的经历以及对于法权问题的探讨中获得,参见《日员参观司法机关纪》,载《申报》1923年2月28日,第13版;《美领事访问审检厅长》,载《申报》1923年3月29日,第15版;《沈厅长与姚公鹤论法权书》,载《申报》1926年2月18日,第13版;《外委来沪声中之地审厅近况》,载《申报》1926年4月6日,第13版。

1932年,当有重长上海地方法院^①的机会时,沈氏虽有第一次“大危难”的惨痛回忆,但他并未对重长之机表现出抗拒之意。而是在接连拒绝任职江西高等法院、徐锡麟小学的校董职位的情况下,选择接受新的任命,重新回归上海司法界,直到1935年去职。前后两个任期加起来有七年之久,沈锡庆与上海司法界的情缘可谓不浅。

近代上海司法界的特殊与复杂,自不待言。因为租界的存在,上海在管辖空间、行政管理领域等方面被人为进行了复杂的切割。具体到法权领域的表现是,作为近代中国法权遭受侵蚀的载体,上海的司法机关类型复杂,法权归属不一。^② 国人为此展开了艰辛地收复工作,希冀能早日实现法权的独立完整。江苏上海第一/第二特区地方法院,江苏高等法院第二/第三分院的设立,便是时人奋斗所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而这些法院,全都是20世纪30年代初才相继成立的。加上上海地方法院,当时上海地区共有五所法院。

在上海这四方杂处之地,各个地区之人群聚于此,江苏、浙江、广东、安徽等地都有上万人分散在上海的华界和租界。^③ 官员,包括司法官地域回避虽仍在实行,^④但其效果如何,显有存疑之处,也即上海的地方官员是旅居同乡之人的

① 上海地方法院的具体沿革情形,可参见《沈锡庆日记》第八册,1935年2月2日,星期六;徐知林等:《上海地方法院概况调查》,出版社不详1932年版。

② 近代上海司法机构的演变情形,可参见滕一龙主编:《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亦可参见汪楫宝:《民国司法志》,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

③ 关于民国时期上海人口的籍贯构成,可参见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117页。

④ 《推事照例回避》,载《申报》1915年4月29日,第1版。

机会大大增加了。^①而且由北向南而来之原为法官,现在选择从事律师的法律人,加诸上海本地的“法官化律师”^②的现象,使上海司法界的关系网络变得错综复杂。

到上海法院任职,为当时司法界所向往。因为此地法院待遇优厚,被人视为肥缺,司法官都千方百计地想调到上海来。^③1925年孙绍康调任为上海地方检察厅厅长,便评价“这个缺在司法界总算是一个优缺了”。^④沈锡庆上任后,在分析自己司法生涯时,也认为自己“所任皆紧要,为一般善于营缘之人所运动不得者”,^⑤其中的“紧要”之地,显然也包括彼时沈氏正任职的上海地方法院。更直观的体现是上海各法院司法官的频繁调动(见表1)。没有一定的社会关系与运作,即使考试成绩再好也不一定能分发到此。^⑥

表1 上海各法院职员在职年限(1931年7月—1932年6月)

单位:个

年限	高二分院	特一地院	高三分院	特二地院	上海地院
一年未滿	4	3	15	1	15
一年以上		10	2	7	8
二年以上	8	21	1	8	20

① [美]顾德曼:《家乡、城市和国家——上海的地缘网络与认同,1853—1937》,宋钻友译,周育民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0页。

② 法官化律师是指法官在退休后选择执行律师业务。参见伏羲:《法官化律师》,载《社会日报》1932年5月31日,第1版。

③ 参见蔡晋:《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上海司法界》,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社会法制》(第1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2页。

④ 孙绍康:《五五回忆录》,出版社不详1941年版,第55页。

⑤ 《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4月16日,星期六。

⑥ 参见林厚祺:《我的一些经历》,福建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文史资料选编第4卷政治军事编》(第5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75页。

续表

年限	高二分院	特一地院	高三分院	特二地院	上海地院
三年以上	3	10	2	4	12
四年以上		3	2	4	3
五年以上	1		1		7
六年以上		2		5	4
七年以上		1			2
八年以上	1	1	1	2	
九年以上	1	4		1	
十年以上	14	21	1	11	7
总计	32	76	25	43	78

资料来源:《上海各法院职员在职年限表》,上海市档案馆藏,Y2-1-89-81。

沈锡庆的家庭成员,对沈的第二次重长,也甚是期待,一场潜在的冲突也因此消弭。此事缘起于沈锡庆曾在 1929 年连天两子,怕影响祖母身体,家人并未告诉祖母此事。^① 而在 1932 年 1 月 22 日,沈氏告知祖母天亡两子的消息,并将前日报纸登载其有望重长上海地方法院的消息一并告诉祖母,祖母则“稍抑悲怀”,“一场危险终算经过”。^② 可知当时其祖母所代表的一般民众对于任职上海法院的满意之态。

不仅如此,上海地方法院“地当通商巨埠,诉讼繁多,系瞻中外,职责异常重要”。^③ 上海法院的人事问题,常牵涉诸多中外各派势力的博弈。沈能两次调任上海司法界,且都担任长官之职,这本身就意味着沈的资本(社会资本、声誉等)的优厚。

但要长期稳固地立足上海司法界,称心如意地使法院有效

①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 年 1 月 21 日,星期四。

②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 年 1 月 22 日,星期五。

③ 《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 年 4 月 21 日,星期四。

运作并非易事。沈锡庆就曾鉴于“人才缺乏,经费困难”而发出“试观全国各地法院,孰能整理完善”的感叹。^①当然,上海司法界总体上并不缺乏司法人才,一因官方重视此地的司法;二来作为司法人才向往之地,其储备人才也不会少。不过据沈氏观察,在上海司法界,资格较深的司法人员均为两特区地方法院调去,而留在沈氏所任上海地方法院的各员均系新近毕业毫无经验之人。^②如何集中人才,是沈在任职期间所要关注的重要事务之一。由此引申出来的是面对调动频繁的上海司法界,以其所担任的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一职来说,如何获取以及保住这个“肥缺”,也是他有意无意中需要考虑的事项之一。人事稳定才能保持政策实行的稳定,否则在政制建设并未稳固的时代,便极有可能出现“予前任上海地审厅长时经五年之整理,各部事务已有一定成规,离职五年,全部废弛”之现象。^③而经费短缺,始终是近代司法改革中的老大难问题,彼时更是“因国难期内经费奇绌,财厅通知书已打折扣,而同人生活艰难”。^④加上沈锡庆任内改建看守所的需要,经费的获取也是其视域范围之要务。

(二) 沈锡庆日记时段的特殊性

《沈锡庆日记》所记录的沈氏在上海地院院长任上自1932年上任到1935年离任的完整时段,在民国司法界的历史上有其特殊性所在。因为这个时段,正好是“梁启超立宪派司法”向“居正辛亥派司法”过渡的时期。^⑤1932年1月居正入主司法

① 《沈锡庆日记》第五册,1933年9月15日,星期五。

②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八册,1935年3月15日,星期五。

③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八册,1935年3月15日,星期五。

④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年3月30日,星期三。

⑤ 江照信将中国近代法律转型中司法进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清末修律(沈家本派),民初变法(梁启超立宪派),法律民族化运动(居正辛亥派)。三个阶段显见的不同之处,便是司法中枢不同的人事组合。参见江照信:《民国没有反沈派——立宪派司法与辛亥派司法》,载《法制史研究》2013年第24期。

院,随着司法行政部在 1934 年 10 月归入司法院,^①司法中枢逐渐变成了国民党老革命或长期从事国民党党务工作者,即辛亥派司法的天下。代表人物除居正外,还有覃振、王用宾、洪陆东等人。而属于立宪派司法的北洋旧人,大多被排挤出司法中枢,如罗文干等。^②但从居正入主司法院到 1934 年 10 月期间,司法行政部仍属于行政院,即使作为司法院长,居正对司法行政部的权限,包括司法行政部内部的人事构造及对各级法院的用人权等都不能直接干涉。沈锡庆任职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期间,正好处在这样一个过渡时段。

在制度并未稳固的过渡时代,制度资本之外的社会资本(人际网络为其重要构成)对一个法院的运行起很大作用,特别是中国这样一个讲求关系的社会,法院人才的获求与经费的获取,无不与一院之长的人际网络情形相关联。沈锡庆第二次任职上海地方法院院长期间,在此之前形成的人际网络,将在其生活与工作中展现,或隐或明地主宰其交往的范围与重心。沈锡庆作为基层法院院长,不仅上联高层(江苏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司法行政部),下系基层(院内)司法官,还与上海地院平级的其他法院(一特地院与二特地院)左右连横。因此,沈锡庆勾连左右上下的职位,为我们以人际网络视角来探索地方法院运作进而明晰影响近代司法运行的因素,提供了支点与视窗。

①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司法行政部的隶属在司法院与行政院之间有多次摇摆,具体为:1928 年 10 月到 1931 年 12 月隶属于司法院,1931 年 12 月到 1934 年 10 月隶属于行政院,1934 年 10 月到 1942 年 12 月隶属于司法院,1942 年 12 月直到国民党退居台湾隶属于行政院。参见张仁善:《司法行政权的无限扩大与司法权的相对缩小——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司法行政部》,载《民国档案》2002 年第 4 期。

② 参见李在全:《法治与党治:国民党政权的司法党化(1923~1948)》,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178 页。

直至现在,由地缘、血缘、学缘等构造而成的人际网络,仍深刻地影响司法界以至国家的方方面面。人际网络中所体现的人情和面子被视作是理解中国社会结构的关键所在。^① 本文所利用的《沈锡庆日记》,完整记载了其上任到离任的时段,他的院长工作因完整的三年而得以比较稳定地展开,该时段也足以让各种社会关系在其日记中得到展现。因而以《沈锡庆日记》为对象来考察,或许能超越个人以及时空的局限性而具有代表性,所得结论将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三] 沈锡庆司法界人际网络素描

作为院长,制度性权力本是附随于职位而来的资本。但近代中国,处于由人治向法治演变的阶段,各项制度并未形成稳定的体系。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在制度性的权力之外,非制度操作的空间也可资利用。在强烈“关系本位”倾向的中国社会中,人际网络便是一种重要的非制度性的社会资本。人际网络的构建,就其基本原料而言,都大同小异,但具体到每一个人来说,又因其特殊的经历与性格而有不同的组合与效果。沈锡庆的日记为展现其在任职期间的司法界的人际网络,提供了样本。

(一) 日记时段的截取与表格内容的说明

笔者以日记中1931年7月31日到1935年11月30日的记录为样本,制作表2和表3,借以展现沈锡庆在上海地方法院任职时在司法界所交往对象的数量、类别分布、周期频率等状况,并总结沈氏司法界人际网络的若干特征。笔者所考察的时

^① 参见金耀基:《关系和网络的建构:一个社会学的诠释》,载《金耀基自选集》,上海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93-116页。

段之所以比沈氏任职上海地方法院的时段有所延展,出于以下考虑。

表2 沈锡庆与新旧司法长官的见面次数

单位:次

姓名	籍贯	学习经历	职位	共事时间	沈主动 拜访与 邀请	沈被 拜访、 被邀请	集体 活动	合计
刘懋初 (德余)	广东 南海	法国里昂 大学	地院首席 检察官	1932. 1— 1932. 11	2	1	1	4
楼英 (玉书)	浙江 义乌	国立北京 法政专门 学校	同上	1932. 11— 1934. 11	13	19	44	76
钟尚斌 (爱棠)	安徽 巢县		同上	1934. 11— 1935. 4	1	3	4	8
罗文干 (钧任)	广东 番禺	牛津大学 法律硕士	司法行政 部部长	1932. 1. 15— 1934. 10. 20	1	2	1	4
居正 (觉生)	湖北 广济	日本东京 法政大学	同上	1934. 10. 20— 1934. 12. 22	0	0	0	0
王用宾 (太羹)	山西 猗氏 (今临猗县)	日本法政 大学	同上	1934. 12. 22— 1935. 4	0	0	0	0
何世桢 (思毅)	安徽 望江	东吴大学 法学院	司法行政 部政务次长	1932. 1. 6— 1932. 7. 12	1	0	0	1
郑天锡 (弗庭)	广东 中山	伦敦大学 法律博士	司法行政 部政务次长	1932. 7. 12— 1934. 10. 20	17	2	6	25
谢冠生 (寿昌)	浙江 嵊县	巴黎大学 法学博士	同上	1934. 10. 20— 1934. 12. 22	0	0	0	0
洪陆东	浙江 黄岩	山西大学 法科毕业	同上	1934. 12. 22— 1935. 4	0	0	0	0
石志泉 (友儒)	湖北 孝感	东京帝国 大学法科	司法行政 部常务次长	1932. 7. 12— 1934. 11. 24	7	1	6	14
潘恩培 (植生)	河北 涿县	京师法律 学堂	同上	1934. 11. 24— 1934. 12. 31	0	0	0	0
谢健 (铸陈)	四川 荣昌	日本东京 法政大学	同上	1935. 2. 21— 1935. 4	0	0	0	0
林彪 (礼源)	广东 中山	美国巴维 利亚大学	江苏高院 院长	1932. 1— 1934. 9. 11	8	5	1	14
朱树声 (韵笙)	湖北 竹山	奉天 法政学堂	同上	1934. 9. 11— 1935. 4	5	1	2	8

续表

姓名	籍贯	学习经历	职位	共事时间	沈主动 拜访与 邀请	沈被 拜访、 被邀请	集体 活动	合 计
沈家彝 (季让)	江苏 江宁	东京 帝国大学 法学部 毕业	高二分院 院长	1932.3— 1935.4	36	7	24	67
王振南 (北溟)	浙江 绍兴	浙江公立 法政专门 学校	高二分院 首席检察官	1932.1— 1935.1	23	22	20	65
郑铎 (英伯)	浙江 兰溪	日本法政 大学	同上	1935.1— 1935.4	3	2	2	7
梁仁杰 (云山)	江西 临川	巴黎大学 法学博士	高三分院 院长	1932.1— 1935.4	3	2	19	24
赵士北 (于朔)	广东 新会	美国 哥伦比亚 大学	高三分院 首席检察官	1932.1— 1935.4	1	2	3	6
周先觉	广东 南海	英国 剑桥大学 法学院	一特地院 院长	1932.1— 1932.11	3	3	3	9
郭云观 (闵畴)	浙江 玉环	北洋大学 法学士	同上	1932.11— 1935.4	24	14	18	55
汪祖泽 (通甫)	广东 番禺	日本 明治大学 法科毕业	一特地院 首席检察官	1932.3— 1932.9	1	2	4	7
向哲浚 (明思)	湖南 宁乡	华盛顿 大学 法学院	一特地院 首席检察官	1932.9— 1935.4	6	6	12	24
应时 (溥泉)	浙江 吴兴	巴黎大学 法学博士	二特 地院院长	1932.1— 1934.4	19	10	18	45
王思默 (正轩)	浙江 绍兴	法国 里昂大学	二特 地院院长	1934.4— 1935.4	5	5	6	16
陈陶丞 (备三)			二特地院 首席检察官	1932.1— 1935.4	7	7	6	20
田立勋 (修之)	湖南 沅陵	京师法律 学堂监狱 专修科	江苏第二 监狱(漕河泾 监狱)典狱长	1932.6— 1932.10	2	7	2	11
田荆华 (种夫)	湖南 桃源	日本东京 警监学校	同上	1932.11— 1933.9	1	6	2	9
任峰 (叔泰)	四川 华阳	日本 明治大学	同上	1933.12— 1935.3	2	3	2	7

续表

姓名	籍贯	学习经历	职位	共事时间	沈主动 拜访与 邀请	沈被 拜访、 被邀请	集体 活动	合 计
朱献文 (郁堂)	浙江 义乌	日本帝国 大学法科 毕业	历任大理院 推事、江苏 高等审判厅 厅长等职位, 时任司法院 参事		21	4	5	30
董康 (授经)	江苏 武进	光绪庚寅 恩科进士	历任大理院 推事、大理院 院长、司法 总长等职, 时任上海 律师职务, 并任东吴 大学法学 院教授		8	1	6	15
张耀曾 (谔西)	云南 大理	东京帝国 大学法科	曾任司法 总长,时业 律师		6	1	7	14
薛笃弼 (子良)	山西 运城	山西 法政学校	曾任司法 次长,时业 律师		2	3	4	9
许世英 (静仁)	安徽 秋浦(今 东至)	丁酉科拔 贡生	历任大理院 院长、司法 总长等职, 时任国民 政府服务 委员会 会员兼主席		3	0	0	3
江庸 (翊云)	福建 长汀	日本 早稻田 大学政治 经济科 毕业	历任京师 高等审判厅 厅长、司法 次长、司法 总长等职, 时业律师		2	0	1	3
章宗祥 (仲和)	浙江 吴兴	日本 帝国大学 法学士	历任大理院 院长、司法 总长等职, 时业银行界		1	0	1	2

资料来源:《沈锡庆日记》(第二册到第九册);滕一龙主编:《上海审判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72-73页。张朋园、沈怀玉合编:《国民政府职官年表(1925—1949)》(第一分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88年版,第259-260页;刘寿林等编:《民国职官年表》(下编),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688-690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现代人物资讯整合系统。

表3 沈锡庆与其他部分司法官的见面次数(5次及以上)

单位:次

姓名	籍贯	学习经历	职位	沈主动 拜访与 邀请	沈被拜访、 被邀请	集体 活动	合 计
王介亭 (道周)	浙江 嵊县	浙江共和 法政专门 学校法律科	本院 书记官长	1	33	13	47
朱维新	浙江 义乌		本院推事	5	19	8	32
钟秋人			上海 地院推事	2	25	5	32
殷汝熊 (书祥)	浙江 平阳	留学日本	上海律师	16	11	1	28
莫寿笙	浙江 绍兴		一特 地院推事	8	16	2	26
庞镜新			本院 推事	0	21	4	25
胡诒谷 (文甫)	浙江 宁波	美国 伊利诺伊 大学法学士	高二分院 庭长/江苏 高院首检	10	2	2	14
汪秀夫	浙江 绍兴		上海地院 检察官	0	9	4	13
周翰 (研香)	浙江 东阳	浙江法政 专门学校 法律	一特 地院庭长	4	1	6	11
马赞明 (述义)	浙江 崇德		浙江高等 法院/二特 院推事	4	3	4	11
赵晓秋			上海地院 庭长/福建 恩明地院 院长	4	5	2	11
郁华 (曼陀)	浙江 富阳	日本 法政大学 法学士	高二 分院庭长	2	2	5	9
陈福民 (哲侯)	江苏 吴县	日本 法政大学	安徽 高等法院 院长	3	4	1	8
周玉圃			高三分院 庭长	1	4	4	9

续表

姓名	籍贯	学习经历	职位	沈主动 拜访与 邀请	沈被拜访、 被邀请	集体 活动	合 计
沈秋墅			司法行政部 科员	3	5	0	8
郑啸泉			前绍兴地方 法院院长	0	8	0	8
宋延华 (孟年)	浙江 嵊县		浙江高等 法院首席 检察官/ 最高法院 推事	3	2	2	7
刘甲一			本院推事	4	0	2	6
庞树蓉	江苏 常熟	日本大学 专门部 政治科	本院推事				
陈仰军			本院推事	0	5	1	6
王元增 (新之)	江苏 嘉定 (今属 上海市)	日本警监 学校	司法行政部 监狱司 司长	1	4	0	5
苏希洵 (子美)	广西 武鸣	巴黎大学 法学博士	司法行政部 总务司司长	3	2	0	5
王厚斋			司法行政部 刑事司司长/ 察哈尔高等 法院	5			5
钟之翰 (静庄)	浙江 诸暨		金华/汉口/ 镇江地院 院长	2	2	1	5

资料来源:《沈锡庆日记》(第二册到第九册);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五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人物索引(宋延华、陈福民、殷叔祥);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近现代人物资讯整合系统;《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职员简明履历表(1934)》,上海市档案馆藏,Q178-1-2。

注:由于篇幅的限制,表格只列了见面次数合计5次及以上的司法界人物。若把沈氏所交往的司法官都列进表格,会造成喧宾夺主,并影响论文形式上的美观。行文中涉及的人物,基本囊括在表格之中。

沈氏在1932年1月21日阅报获知自己将能重长上海地方法院,1月23日接到司法行政部任命训令,1935年4月11日收

到免职训令,4月23日完全交接完毕,彻底离职。从其实际任职时间来看,似应以1932年1月23日到1935年4月23日作为样本。但是为考察他的人际网络对其自身上任与离职产生的影响,以及在某种程度上考察他在任职期间所接触的不同人的亲密程度,即何人只是工作关系、何人在工作关系之外还有着私人联系,有必要将此期间适当延展。笔者以其离任司法行政部刑事司科员(1931年7月31日)为起点,在这之后到他接到调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的训令之间有近6个月,因此可以看到他对各种职位的取舍态度以及他在司法界的交游实况。以其1935年11月30日离开上海为终点,一方面可以考察其在任职期间所形成的新的人际关系的发展,另一方面可以总结其在上海的旧有关系。总之,将其任职前与卸职后一定时段纳入考察范围,可以更加充分地展现沈锡庆在司法界人际网络的稳定核心圈层,可以对司法界人际网络中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混合型关系等不同类别有所明晰。^①

沈氏与司法界同仁的交际往来搭建了上海地方法院运作的主要脉络。表2主要统计沈氏与当时上海法院各院(包括本院)、监狱、江苏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以及在北洋政府司法部担任长官的人的交往情形,表中的共事时间主要为其他长官与

① 中国社会中个人可能拥有三大类人际关系,即情感性关系,工具性关系和混合型关系。情感性关系通常都是一种长久而稳定的关系。这种关系可以满足个人在关爱、温情、安全感、归属感等方面的需要。像家庭、密友等主要社会团体中的人际关系,都是情感关系之例。当然,除了满足情感方面的需要之外,个人也可以用这种关系来获取他所需要的资源。不过在这类关系中,情感性成分仍然大于工具性的成分。工具性关系,与情感性关系相对,个人和他人建立工具性关系时,不过是以这种关系作为获得其他目标的一种手段或一种工具,因此,这种关系基本上是短暂而不稳定的。混合型关系,交往双方彼此认识而且有一定程度的情感色彩,但其情感关系又不像主要社会团体那样,深厚到可以随意表现出真诚的行为。一般而言,这类关系可能包含亲戚、邻居、师生、同学、同事、同乡等不同的角色关系。参见黄光国:《人情和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黄光国主编:《面子——中国人的权力游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7-10页。

1932年1月—1935年4月(沈锡庆任职上海地院时间段)的交集。表3为沈锡庆任职期间内,他与除司法长官之外的司法人员的交往情况。表中的交往类型,按照见面的指向性分为三项。沈主动拜访与邀请的次数越多,也即此人在地位上可能会高于沈;而沈被拜访的次数、被邀请的次数多,则反之。交往总计次数的不同,代表着不同的人与沈氏不同的亲密程度。

(二) 沈氏人际网络的特质

根据表2、表3所示并结合日记的具体内容,可得出沈锡庆任职上海地方法院时,他在司法界人际网络的特质:

一,交游广泛。沈锡庆作为中国近代第一代法律人^①,经过多年耕耘,在司法界有广泛的交游。他在上海各法院、江苏高等法院、司法行政部都有广泛的旧属、熟人与旧识。1932年3月10日赴任途中,“上午九时,赴江苏高等法院先拜各熟人,因高院推检、书记官中尚有旧识十余人须见”^②。1932年3月14日到职后,他便分别到上海各个法院拜会,“院长、首席检察官、推检各官,该四院中均多旧识”。^③后去往南京司法行政部时,“至部院各熟人处拜访”。^④ 去往镇江财政厅时,访镇江地方法院,“胡文甫院长及该院庭长推检内有半数系予旧属”。^⑤

二,新旧夹杂。在其司法圈子中,既有时任其职的司法官,也有或已退出司法界或在司法界的其他领域(如律师行业)服

① 关于中国近代第一代法律人的表述可以参见 Huei-min Sun, *From Literati to Legal Professionals: The First-Generation Chinese Law School Graduates and Their Career Patterns*, in Robert Culp, U Eddy & Wen-hsin Yeh, *Knowledge Acts in Modern China: Ideas, Institutions, and Identities*, Institute of East Asian Studies, 2016, p. 89-114.

② 《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年3月10日,星期四。

③ 《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年3月14日,星期一。

④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3年1月12日,星期四。

⑤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3年1月13日,星期五。

务的法律人。如沈氏与北洋政府时期的司法部高层如董康、张耀曾^①等有较多的交往。很多北洋政府时期任职于司法界的人士,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南下到上海等地。这些北洋旧人往往选择执行律师职务,同时在上海各校兼授法律课程。立足上海、面向南京的选择,没有阻断他们进入司法权力中枢的可能性,可谓“攻守兼备”。^② 这些人虽然大多不再位居司法高层,但沈氏在日记中仍以他们的旧职如司法总长等来称呼他们。

从沈锡庆的日记可以看出,他与大致同代的法律人在20世纪30年代还有不少的交往,其中就包括沈氏的老长官们。包括沈氏在内的这群人大致都有留学日本攻读法政学科的经历,在他们进入南京国民政府之前,在司法界本就有较高的名望与地位,这让他们在司法界拥有重要的人脉关系和号召力。^③ 表2显示的是,沈锡庆与董康和张耀曾等前司法高层的交往,存在单向的特征,即以沈氏主动拜访为主。

三,差序格局。沈氏与不同人的交往次数是不同的。结合日记的实际内容,沈氏与其见面越多,表明二者的联系越紧密。以下原因塑造了沈氏人际网络的差序格局。

其一,共事的时间。沈氏人际网络中的这个人,在沈氏任职的三年当中,在上海法院或者司法高层工作的时间越长,则两人

① 与张耀曾日记进行对读可知,虽然沈氏日记中有多次与张的交往记录,但在张氏的日记中,却只记载有一次与沈氏的会面,并对沈氏有“干练,但不免挟有侠气”的评价。这样一种日记对读的方式,也即通过以日记群来研读某一时期某一业界的交往,将会是一种有趣的研究方式。参见张耀曾:《求不得斋日记》(1927—1938),载杨琥编:《宪政救国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345页。

② 参见陈颐:《〈法律大辞典〉编纂所见1930年代前期法律界的交往》,载《法制史研究》2015年第28期。

③ 在北京政府时期曾经担任过司法次长的余绍宋,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在形式上脱离司法界,但仍有许多司法界人士来找他,托他向司法行政部写荐函,以谋求司法界相应的职位。具体的事例见下文。

接触的机会则可能会越多;反之,则越少。他与几任上海地方法院的首席检察官的交往可以为证。

其二,工作关系。工作关系要求沈氏必须与本院书记官长、首席检察官以及上海各院司法长官以及江苏高院的长官有往来。如按照当时的制度规定,上海地方法院的一些司法行政事项需要向江苏高二分院长官汇报,^①因此在高二分院长沈家彝比高三分院长梁仁杰与沈锡庆共事时间少两个月的情况下,沈氏与沈家彝的接触次数却明显高于与梁仁杰的接触次数。

其三,私人关系。在公务表象之下,也暗含着他的选择倾向。在与本院司法官的交往过程中,他与朱维新、楼玉书等人的交往格外密切。从日记中可看出,不止是由于工作关系,更有私人方面的特殊关系的原因。据阮毅成回忆,沈在上海担任地方审判厅长时,朱任江苏高等审判厅长,系属上下级关系。^② 沈对朱极为尊重,朱献文的女公子朱荷英在上海念书,也托付给沈氏一家代为照顾。朱维新正是朱献文的弟弟。朱献文的义乌同乡楼玉书,与沈不仅在工作上交往密切,在工作之外,也有相较于其前任(刘懋初)与后任(钟尚斌)更具私密性的交流。^③ 与上海其他法院司法官的交流,则可以明显地看到他与同乡王振南与周翰交往密切。^④ 当然,对司法界的绍兴同乡,沈氏并非一概毫无原则的温情脉脉。如对王思默这位先后任职江苏高等法院

① 这可以从日记当中看出。另外,通过其他一些资料也可旁证之,参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院长为1930年10月9日密令事所给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之训令》,载费唐:《费唐法官研究上海公共租界情形报告书》第1卷,工部局华文处译述,上海书店2012年版,第422页。

② 参见阮毅成:《彼岸》,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第11页。

③ 兹举一例,当得知朱献文的女儿在学校发生与男生冲突之事时,作为家长代表,沈锡庆即邀楼玉书随同前往学校交涉。参见《沈锡庆日记》第六册,1933年12月11日,星期一。

④ 王振南、朱维新与周研香同租住一寓。参见《沈锡庆日记》第八册,1935年1月19日,星期六。

首席检察官、吴县地院、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院长的绍兴同乡,沈氏的印象并不好:“上午十一时,新任上海第二特区地院院长王思默偕书记官长厉平来访。王系绍兴县人,由吴县地院调任来此,在司法界资格甚浅,虽曾任江苏高院首检察官有年,颇著成绩。今日晤谈之下语多外行,显非励精图治之人,厉书记官长亦属外行。”^①沈氏记载的与王的十几次会面,都是基于工作或往来回拜而不得不为的应酬,殊少基于私人关系的往来。

四,女性角色的缺失。沈氏的人际网络中,除了其女性家庭成员之外,几乎没有女性的身影。即使有女性出现,亦只限于与工作有别的生活场合,大多是沈锡庆男性友人的妻子,表述往往为“男性友人姓名”加“夫妇”的形式,如“陈朵如夫妇”等。这是日记反映的一目了然的客观情形。在法律人的社会关系的叙述中,女性角色的缺失并不只是限于沈锡庆一人。在张耀曾日记^②、余绍宋日记^③、蒋慰祖日记^④、居正日记^⑤和杜保祺书信^⑥等法律人的私密记载中,也几乎见不到女性法律人的身影。目前笔者唯一看到的与女性法律人有较多接触的为朱仁律师,他所交往的是女律师李彩霞。^⑦当时女性法律人数量极少可能是

① 《沈锡庆日记》第七册,1934年5月11日,星期五。

② 张耀曾:《求不得斋日记》(1927—1938),载杨晓编:《宪政救国梦:张耀曾先生文存》,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③ 余绍宋:《余绍宋日记》,中华书局2012年版。

④ 此份日记只有三个月的记录,且混在其他文档里面。参见《三青团五分团系统表及行政院专用电台团体照片,法院处令簿、日记本》,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4。

⑤ 居正:《居正日记书信未刊稿》,谢幼田整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⑥ 杜保祺书信,混杂在一个与标题不符的文档中。参见《上海高等法院检察处检察官杜保祺有关施政方针工作计划执行情况报告》,上海市档案馆藏,Q188-1-402。

⑦ 《朱仁律师日记》,上海市档案馆藏,Q459-1-146。史良被董康称为“沈锡庆弟子”,但这位沈氏的女弟子在日记中并未有出过场。参见董康:《东游日记》,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11页。

导致此种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①

一个人的人际网络因其经历、性格等因素,常呈现不同的具体样态。但与此同时,因为身处同一文化氛围当中,这一具体样态常会粘带某个领域的人际网络的普遍特征。沈锡庆个人特殊样态的人际网络,实际涵盖了当时若干司法界人际网络的共通要素,反映当时司法界的社会交际的基本样态。就沈氏任职期间的活动而言,除制度赋予的可见资本之外,人际网络所蕴含的隐性社会资本,也是他顺利办成一些事情的重要支撑。当然,司法高层调动而导致的沈氏的司法界人际网络等资本的衰退,也是其遇事不顺直至他被免职的原因之一。

〔四〕人际网络视野下的法院运作：以人事与经费为例^②

人事与经费,对于法院的运行来说,实为命门所在。一院长对二者的掌控,关系到其所管理的法院是否能够顺利运行以及他自身任职的期限。本部分旨在分别以人事与经费为例来描摹地方法院的运作,以审视司法长官的人际网络在这两个问题中的展现。

近代中国司法界,在人事任用上并未形成稳定的制度,这是近代中国“缺乏全国有效性的政治法制”的一个缩影。近代以来与政治有关的现象,包括法律现象,“常常交织着个人的影响

① 民国时期上海女性法律人数量的情况,参见孙慧敏:《民国时期上海的女律师》,载《近代中国妇女史研究》2006年第14期。

② 本文所探讨与关注的为司法界内部的人际网络,大致以司法行政为关注对象,且由于篇幅的限制,因此更能反映司法界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人际交往的司法审判,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笔者将另做专文讨论。

和相互关系”。^① 因此,考察近代以来的社会现象与变迁,应同时兼顾制度与非制度两个层面。^②

司法界的人事任用,虽有一些不成系统的制度规范,^③但并未完全抹杀非制度操作的可能空间。录事、执达员的选任,虽铺有考试制度,然而最终的录用之权乃在院长。对此,沈氏在日记中反驳对他“任用私人”的控诉时提到,“在□□(引者注:代指锡庆,原文如此)有权录用之录事执达员两项,均由考试合格按名递补,有卷可查”,可资印证。^④ “司法机构家族化”^⑤之论断大致以此为背景。虽然院长对于推事、检察官、书记官之类并无直接决定任用的权力,而是有专门的《司法官考试任用考试暂行标准》《司法官任用暂行标准》等规章制度来进行规制,且形式上必须由司法行政部下达人事任令来确定。但从制度上观之,地方法院院长在其中又具有“呈请委派职员事项”^⑥之建议之权;在非制度层面,司法界复杂的社会关系,往往会成为推荐司法官与书记官背后的主因。具备司法官或者书记官资格的候选人,最终是否获得一个比较满意的职缺,具有很大的可操作空间。沈氏自己能再度担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一职,也脱离

① [美]包华德主编:《民国名人传记辞典》第一分册,沈自敏译,林东民校,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页。

② 目前同时兼顾制度层面与非制度层面(社会关系)来考察民国时期人事问题的著作,当以鲁卫东对民国时期中央官僚的研究为代表。参见鲁卫东:《民国中央官僚的群体结构和社会关系(1912—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

③ 关于这方面的内容,可以参见毕连芳:《中国近代法官制度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10—129页。

④ 《沈锡庆日记》第六册,1934年3月9日,星期五。

⑤ “司法机构家族化”是指由于司法长官常将自己的亲私安置到司法机构里来,司法机构常被人戏谑为某人的家族机构的一种现象。参见龚汝富:《民国时期地方司法机构家族化之危害及整治困境》,载《第三届近代法律史论坛会议论文集》,2017年4月。

⑥ 《地方法院院长办事权限暂行条例》,载《司法公报》1928年第3期。

不了他与当时司法行政中枢长官良好的人际网络,下文将展开论述。在法院经费的获取上,也有类似的情况。这在沈锡庆任职期间申请改造扩建监狱经费的过程中有集中的体现。

(一)瓜葛相连的人事

关于近代上海官方机构人事问题的探究,已有多种论著涉及。早期的研究者,如安克强把研究集中在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府职员,尤其是主要领导官员方面,以“人物传记学”方法去理解正式结构之外更琐细的运作及市政府官员内部存在的非正式关系。^①他认为在一定程度上招聘市政府官员没有严格的规定,依照基本的“关系”概念形成的各种非正式做法,无奇不有。^②蒋宝麟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利用新近发现的资料,引入专业与政治的视角,论述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受专业化倾向、派系政治、党治及人治等多重因素影响的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③也有若干对上海司法机构的人事问题的研究,如姚远关于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的研究。^④不过其中的研究都以制度梳理为主,缺乏对非正式关系的关注。在进入正论之前,需要强调的是,笔者并不否认正式制度对于人事问题的重要性,对于非正式因素的探究需要对正式制度的熟识为基础。

沈锡庆重长上海地院院长与最后被免职,与司法行政中枢“熟人”数量的消长相关联。沈氏曾自述与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郑天锡为“熟人”,在其任上,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石志泉的

① 参见[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德培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4页。

② 参见[法]安克强:《1927—1937年的上海——市政权、地方性和现代化》,张德培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86页。

③ 参见蒋宝麟:《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市政府的人事构成与权力格局》,载《近代史研究》2018年第6期。

④ 参见姚远:《上海公共租界特区法院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87-92页。

弟弟则在上海地院担任推事一职。根据表2可知,沈氏任职上海地院的时段大致与郑、石二人任职司法行政部次长的时段相当。在郑上任后不久,沈得到了重新启用;在郑、石二人离任不久,沈也被免职。^① 院内人事,也可以看到有多位与沈有同乡、僚属等特殊社会关系的职员,这是他运用正式制度与社会资本的结果。

沈锡庆1931年7月底辞去司法行政部刑事科科长一职后,1932年1月接到司法行政部任命其为上海地院院长的调令之前,一直赋闲在绍兴东浦老家,形式上似与当时司法界有所区隔。但实际上,在此段时间内,他所交往之人,多数仍是司法界的同仁,他也关注并经常参与司法界的情事。1931年12月31日,他阅报得知罗文干被任命为司法行政部部长,司法行政部改隶行政院,司法院长应兼最高法院长管辖最高法院、行政法院与高等官吏惩戒会等三机关。^② 1932年1月4日,沈氏阅报又得知何世桢已经成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郑天锡为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他便驰书向这些“熟人”道贺。^③

郑天锡与余绍宋有密切的关系,在得知郑任职司法行政中枢后,当时已经退出司法界的余绍宋发出了“蒞庭作官,余将不胜累矣”的慨叹。^④ 余绍宋与沈锡庆同为浙江人,在此前也有过

① 三人的任职时段:沈1932年1月—1935年4月,郑1932年1月—1934年10月,石1932年7月—1934年11月。

②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1年12月31日,星期四。

③ 《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1月4日,星期一。

④ 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90页。

交往,余绍宋对沈锡庆有所赏识。^①在这之后不久(1932年1月21日),报纸上出现了他被任命为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之消息,只是他自己还不确定消息是否属实。次日(1月22日),司法部友人刘谨菴向他证实了重长上海地方法院的消息。不久,罗文干也写信给沈锡庆,表明让沈氏整顿上海地院的厚望:“接司法行政部罗钧任部长来信,内有沪院不理人口久矣,故特借重长才以资整理,涤瑕荡垢有厚望等语。”^②

虽然司法行政部的训令于1932年1月23日下发,并多次催促其赶快上任。^③但或许有了1927年“大危难”的教训,且此时上海面临日本军队的威胁,沈氏显得非常谨慎。他并不急于赴任,而是利用其彼时在上海的熟人,打听消息。任令发布当天,他便函招上海地方检察院汪秀夫去往绍兴,当面询问法院内部情形。^④两天以后,又把汪秀夫叫到绍兴了解“沪院现状及一切情形”。^⑤

与此同时,沈开始“呼朋唤友”,进行人事谋划。他首先叫来内弟陈荫生,“拟偕往沪院办事予先予囑为预备”。^⑥他又邀

① 在1921年8月,时任司法部次长的余绍宋曾将沈锡庆调到位于哈尔滨的东省特区法院,“柴映波在哈为人攻击甚烈,因令回张家口本任,而以沈庆生调哈,谅能胜任愉快也。”能将沈调任到那样一个多事之地,也反映了同为浙人的余绍宋对沈的赏识。从《余绍宋日记》可以看出余绍宋与浙江司法官之间的联系,以及他对浙江司法官的熟识与了解。沈锡庆即为其一。二人的交往也可在余氏的日记当中窥见一二,“沈庆生自济南来,谈山东司法事,坐良久始去。”参见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一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195页;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三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872页。《沈锡庆日记》第五册,1933年5月19日,星期五。

② 《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2月19日,星期五。

③ 参见《法部令催沈院长赴任》,载《法律评论(北京)》1932年第9卷第21/22期。

④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1月23日,星期六。

⑤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1月26日,星期二。

⑥ 《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1月29日,星期五。

请另外两位熟人赴沪就事,但两人均不愿就,后邀钟秋人暂任上海地院书记官长。^①王介亭本为绍兴地方法院的书记官长,北洋时期曾与沈氏同去湖南、浙江永嘉等地担任书记官长之职。^②沈氏此次也将这位同乡兼旧属下带到了上海地院,充任本院的书记官长。^③他安排具有“关系”的用人行为,也为他遭人控诉“任用私人”埋下了伏笔。(见表4)

表4 与沈锡庆有特殊社会关系的司法官

姓名	职位	社会关系	资料来源*
郑天锡 (蕤庭)	司法行政部 政务次长	“熟人”	1932年1月4日星期一
何世楨 (思毅)	司法行政部 政务次长	“熟人”	1932年1月4日星期一
朱献文 (郁堂)	司法院参事	旧长官	阮毅成:《彼岸》,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2年,第11页
沈秋墅	司法行政部 科员	同乡兼部友	1932年8月18日星期二,1932年1月23日星期六
刘子昂 (谨菴)	司法行政部 科员	“司法部 友人”	1932年1月22日星期五
石志祥	本院推事	石志泉的 弟弟	1932年8月27日星期六
王介亭 (道周)	本院书记 官长	同乡兼旧属	1932年4月23日星期六;倪征燠:《淡泊从容莅海牙》,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年,第128页
汪秀夫	本院检察官	同乡	1931年8月3日星期一
王善祥	本院学习 推事	许世英的 外甥	1932年9月12日星期一
朱维新	本院推事	朱献文的 弟弟	1933年12月11日星期一

① 《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1月28日,星期四。

② 参见《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职员简明履历表》,上海市档案馆藏, Q178-1-2。

③ 《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年4月23日,星期六。

续表

姓名	职位	社会关系	资料来源
楼英 (玉书)	本院首席 检察官	朱献文的 同乡	1932年11月17日星期四

* 如果是来自《沈锡庆日记》，则只记日期。

在离任前两年，他分别遭到两次控诉，其中都有一条指其“任用私人”。基于当时司法行政部出台的回避法令，控诉人认为钟超、姚福祥推事以及王介亭与沈氏有姻亲关系，有违回避法令，在法律上有可追责的原因。^① 沈氏对控诉均有答复，他驳论到三个人均是“在司法机关服务十余年，均有相当资格，且均系成绩卓著之员”，^②而且与他并没有姻亲关系，他们的调动均是遵奉部令的结果。但从其自述来看，这些人的确与其有特殊的社会关系，当然就目前证据来看，并不能确定是否为姻亲关系。姚福祥、钟超、王介亭皆在沈氏上任后不久即被调来，分别为1932年12月、1932年8月、1932年5月。^③ 王介亭是沈锡庆的同乡兼旧属。姚福祥与钟超也均是沈氏同乡。^④ 前者曾在沈锡庆任职浙江永嘉地审厅长时，与其搭档，任职该厅书记官一职。^⑤ 后者从山东福山地方法院调来，而山东曾是沈氏曾任职过的地方，其所邀的钟秋人也在山东烟台。

与沈氏大致同时期招致控诉的还有沈锡庆的顶头上司罗文

① 1932年出台的《司法官任用回避办法》规定，所有各级法院司法官书记官，无论与本院或该管上级法院院长、首席检察官，暨监所职员与本管或上级长官，如有四亲等内血族或三亲等内姻族关系者，应即自行声明回避，否则，如果发现，那么将会对院长或首席检察官进行惩戒。参见《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官规、任用、法官任用及回避事项（1932）》，上海市档案馆藏，Q181-1-85。

② 《沈锡庆日记》第六册，1934年3月9日，星期五。

③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六册，1934年3月9日，星期五。

④ 参见《江苏上海地方法院职员简明履历表》，上海市档案馆藏，Q178-1-2。

⑤ 参见《高等审判厅长经家龄委任姚福祥为永嘉地审厅书记官》，载《时报》1918年12月6日，第3版。

干和石志泉。其中对石志泉的控诉也涉及他在人事任用上的私情:

.....

(三)乘机张大其权威

查司法行政部罗部长前兼外交部长,适中日战争,从事于外交之日常多,而处理司法之事常少。司法行政内部虽设次长二人,郑次长每因视察司法事宜分驰各省,所有部务一委诸石志泉次长单独主办。石志泉次长前充北京大理院推事,尚知法。乃幸膺次长之职,大变从前面目,并乘罗部长分身外交、郑次长驰驱四出之机会,大放其所教授之学生及其湖北同乡人,尽攫司法权位,并为故宫舞弊案内之易姓多方运动。堂堂司法部次长,对于司法人员故为高下其手,谓非伸张势力,自固其位谁能信之。应澈究者三。

.....

(五)任用胞弟之不当

查上海为华洋杂处之区,从前仅设一地方法院,嗣因华洋诉讼日益增多,乃增设上海特区法院以维持中外之安宁。是以上海特区法院之员薪较他法院为优,上海特区法院之法官资格自较他法院更当注意。石志泉次长对于普通法院之法官,平日极讲资格,乃对其胞弟弟石某,未经毕业任意派充上海特区法院推事。岂司法次长之弟可以不言资格乎?上海特区所有案件何等口(门字框)重,可以无资格之法官处理之乎?其是否违法应请澈究者五。^①

^① 《上海法学报社呈控司法行政部次长石志泉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11/37.9。

官方当时即以无法查找到控诉人“上海法学报社”而认为系为捏控。撇开违法与否,司法长官任用与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的现象,其实并不少见。在对罗文干的控诉中,则也直指其“新用法官之标准除少数亲信外以曾在伪政府时代助罗文干出狱者为上选”,“专事引用反革命腐劣份子以排斥革命司法人才”。^①不止是他们,他们的前任魏道明以及后任王用宾都受到过任用私人的控诉。

.....

任用私人魏道明、朱履龢因重视法收,恐外人得窥内幕,县所以大用私人之不容已也,故特委朱履之表弟彭清鹏为简任秘书兼会计科长,彭之姪为收支员,又委朱履之婿李某为会计员,故其浮支出均可伪造簿籍而无恐。此外更委郑毓秀之胞兄郑燎为监狱司长,朱履龢之胞兄朱履诚为科长。魏道明之妹倩钮传椿为收发员,一跃而为司法院秘书。于是钮传椿之胞兄本非司法界人,亦得江苏第一监狱长。乃更有魏道明之内亲胡元椿仅学铁道一年,朱履龢之表弟彭望业毫无法律知识,一则为吴县地方法院院长,一则为江宁地方法院院长,尤为可怪。其余各地法官任意更调,无非为之私人排斥异己,贿赂公行,无耻已极。司法本为人权保障,似此爪牙密布,蠹视无厌,司法部几成魏朱郑氏之宗祠。各地法院莫不豺狼当道,民众号呼无门,何以对总理在天灵?何以对国家厚禄之遇?

^① 《请撤惩司法行政部长罗文干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11/37.4。

此其大罪四也。^①

(二)蔽贤任私,应否长法部

该王用宾任事两年,专以蔽塞贤路,任用私人为能事。首都法院推检书记官十之八九为王乡亲,可查山西不合格之法官亦由该部临时考试取得法官资格。更举近例陈大器为其恩人,除此即补特二区推事,七日又升上海高三分院推事。其余终身候补不得补缺者比比皆是。该部长似此营私舞弊,窃为蔽贤,人人皆恨之刺骨,应否久充部长应请明令释疑。^②

无论任用私人是否必然导致违法,但这些可以说明的是,人际网络在司法机关的丛集之态。

1934年10月,司法行政部由行政院复归于司法院管辖,随之而来的是与沈氏大致同一时担任司法行政部中枢长官的罗文干、石志泉和郑天锡,也即大体属于立宪派司法中枢成员纷纷被调离,而辛亥派正式入主,掌控司法行政大权。司法院院长居正暂时兼任司法行政部长(不久后王用宾任此职),谢冠生担任政务次长(后洪陆东任此职),潘恩培为常务次长(后谢健任此职)。沈氏与新任司法行政中枢长官的人际关系状况,可由以下这件事窥探一二。他视自己为“无势无力又恶钻营”,“自入世以来非特不肯求人,即人之求予也无不审慎考量”。^③在1934年江苏各地院长官纷纷晋谒新任司法行政部长官居正之时,沈氏则显得特立独行。对当时的奔竞之风,即建构并利用社会关系来为自己求得职位或晋升之机,他表现出不屑的态度:

① 《请查办司法行政部长魏道明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11/37.2。

② 《请撤惩司法部长王用宾案》,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政11/37.13。

③ 《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年4月16日,星期六。

江苏四地院,彼三院长均已往谒新任居兼部长,唯予尚未往谒,嘱速晋京一行云。事承关者,极为可感,唯予意地院管辖于高院,正当公事均应由高院核转,无晋谒部长之必要。现在钻营风盛,颇多逾分要求,直接干谒成风气,予向不以为然。故此次部次长更动,他人皆往,予独不然。殊不知又以此而被人目为奇异。^①

他自己并没有像其他地院院长那样,前往南京拜谒新任司法行政部部长居正,个中缘由,沈氏自述为不愿与钻营之风同流合污。但沈氏似有着类似的“钻营”行为,有言行不符之嫌。如上文提及的在1932年1月,在得知何世桢被任命为司法行政部政务次长,郑天锡被任命为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后,便以驰书的方式向这些“熟人”道贺。^②这似是一种变相的拜谒。

1934年的第一次控诉行为并未给沈氏带来什么后果,1935年的第二次控诉,伴随着司法行政中枢人事格局的变动,在被控诉后两个月之后,他便被免去上海地方法院院长之职。^③与法院院长休戚与共的书记官长同乡王介亭,在沈氏离职后一个月左右,也调离了上海地方法院,而去了与沈锡庆“彼此意见甚相融洽”^④的同为浙江人的郭云观所执掌的上海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当书记官。^⑤

从其上任到离任的这段时间,对本院职员任用,沈氏倾向于与自己有特殊社会关系的人。他能顺利任职上海地方法院以及最后黯然离职,也不能排除人际网络在其中的功效。正因为如此,在近代司法人事任用领域,虽制定有相应的规章制度,但

① 《沈锡庆日记》第八册,1934年12月7日,星期五。

② 《沈锡庆日记》第二册,1932年1月4日,星期一。

③ 《沈锡庆日记》第八册,1935年4月10日,星期三。

④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3年2月7日,星期二。

⑤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九册,1935年6月2日,星期天。

在制度之外,基于人际网络等社会资本的运作也大昌其道。就笔者阅读《余绍宋日记》所得,余氏作为北洋政府时期司法部次长,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已经脱离司法界,但仍有许多人上门向他请托,让他向当时司法行政部长官(罗文干等)写推荐信,以谋求特定地区的法院的某个职位。兹举其中一例,如1932年1月27日,时人知道余绍宋与新上任的司法行政部次长郑天锡交谊甚笃,便请其代为向郑作书求调。“姜渭贤自苏州来为其子树滋求调上海法院,告以非宜,不听,必欲余为作书,只得应之。蒞庭作官,余将不胜其累矣。”^①此点也印证了司法长官即使从原有职位上退下来,形式上与司法界相脱离,但实质上在司法界仍有一定的号召力和人脉。

(二) 短绌经费与无限需求

1933年司法行政部下发了一道训令,从其内容来看,反映了地方司法经费百弊丛生之现状,常常面临“省款拨不足额或留院法收入不敷出”的窘境,这也导致了“任意挪用印状工本,甚至擅动诉讼存款,日积月累亏垫甚钜”的乱象,且各地法院常存在司法经费分配不均之处。^② 法院司法经费短缺,从当时司法经费总量的缺少而导致下发到某地院的经费也较少,可以得到解释;法院司法经费分配不均,则有很多影响因素,在制度之外,往往受制于一院之长在司法界的人际网络的状况。

1941年前,法院的经费仍由各省库负责,省库一般会制定每年的预算,其中有部分是司法预算,然后将钱拨付给高等法院,由其在省内各级法院间进行分配。吴燕以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四川地方司法建设中的经费问题为视角,根据详实的档案等史料,认为“地方是否拨款,拨款多少取决于掌握一方实权的

① 余绍宋:《余绍宋日记》第四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990页。

② 《各省司法经费应量入为出统筹支配》,载《法令周刊》1933年第160期。

行政或军阀的意志,而非依照司法独立的原则和最高司法当局的指令”。^① 侯欣一教授在考察西安地方法院的经费制度后得出结论,“最终比例,则完全取决于西安地方法院院长与省高等法院的关系和协调能力”,^②且“经费上的这种变相依赖,使西安地方法院在某些时候必须顾及与省高等法院院长的关系”。^③这其中都在强调“人”的因素在法院获取司法经费方面的地位。但人的因素到底在其中怎样发挥影响,兹就以沈锡庆任职上海地院院长期间,对扩建改造看守所的费用申请为例来考察。

看守所的扩建费用,一部分可以向高等法院申请,另外司法行政部在管理各省、市法院和监所扩建以及修建少量新式监狱方面具有一定的经费,因此也可向司法行政部进行申请。^④但面对下级的申请,并没有制度规定上级的因应结果。换言之,上级可以完全拒绝,也可完全赞同,或者部分认可。在制度并不完善的情形下,人际网络的状况将对资源的争夺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沈锡庆便是在起初被江苏高院拒绝的情况下,利用自己与司法行政中枢长官良好的人际网络,为上海地院扩建改造看守所争取到了经费。

当时的地院看守所,在沈氏看来,的确有扩建改造的必要性。因为其环境恶劣,景况堪忧。面对看守所不堪的状况,沈氏重长上海地院伊始,便开始谋划扩充看守所,“拟有扩充详细计

① 吴燕:《理想与现实:南京国民政府地方司法建设中的经费问题》,载《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4期。

② 侯欣一:《创制、运行与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3页。

③ 侯欣一:《创制、运行与变异:民国时期西安地方法院研究》,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244页。

④ 这与地方法院上交司法收入的路径有关。司法经费未由南京国民政府中央财政统一支付之前,各省司法收入,一部分解送司法行政部。一部分由高等法院留用,以补本省司法经费之不足。参见汪楫宝:《民国司法志》,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5页。

划,绘具图籍,呈院转部核示,需费约三万余元”,^①而怎么去获得改建扩充看守所的经费,则成为沈氏任职期间一件重要之事。

1932年8月25日,申请首先得到了江苏高院的回应,结果并不理想。沈锡庆在与高院林彪院长的面洽之下得知,江苏财政厅还未下拨司法经费,即便下拨,经费也会首先用于旧监狱的整理。^②总之,此次经费申请无果而终。次日,沈氏来到了司法行政部,企盼能得到司法行政部的资助。到南京后,他先是去司法行政部见了诸位旧友,后又见了总务司司长苏希洵、监狱司司长王新之、常务次长石志泉、政务次长郑天锡,与他们商讨扩建上海地院看守所问题。具体的谈话内容无从得知,但最后的结果颇为理想:沈锡庆所见过的这些人都认可扩建上海地院看守所的重要性,最后决定“由江苏高院筹措半数,部中补助半数,即由中央地方各半负担以成之”。^③这样的预算安排也得到了国民政府的准许,“拟予如数核定本案概算为四万九千九百九十九元,以重狱政等语,复经提出本会议第三七八次会议决议,照审查意见通过”,^④其中司法行政部拨付一万二千元。^⑤江苏高院在上峰的压力下,最后也同意了司法行政部的计划。

为何会出现江苏高院拒绝,而司法行政部认可的情况?人际关系是其中的重要原因。由表2可知,沈氏与高院院长林彪有14次见面,结合实际内容看,都以例行公事为主,按照沈氏的

①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2年8月25日,星期四。

②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2年8月25日,星期四。

③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2年8月26日,星期五。

④ 《国民政府训令第六一九号》,载《国民政府公报(南京1927)》1933年第1315期。

⑤ 《沈锡庆日记》第四册,1933年1月12日,星期四。

话来说,“再须见林礼源(彪)院长循例数语”,^①只是循例而已。林院长作为高院院长,循例需每年对包括上海地院在内的所属各院视察两次,沈氏与他的接触,也基本限于林院长的巡视,没有涉及私人关系的应酬往来。而沈与林院长的后任朱树声院长之间的交往,则与林院长有很大的不同。首先,从次数上来看,沈与林彪的上下级关系共维持了两年零八个月,而见面往来总共 14 次,沈与朱树声的上下级关系共维持了 7 个月,但迎还往来有 8 次,从频度上来看,高于前者;其次,从具体应酬的内容上,则沈氏与朱院长两人早就认识,^②关系更加密切。

沈锡庆在履职上海地院院长之前,便任职于司法行政部,内有多熟人。而且司法行政部常务次长石志泉的弟弟便在上海地院当推事,二者因此有了进一步的联系。因此,不仅申请经费的事被石志泉批准,和经费一并提出的“添正缺推事四员,检察官一员,书记官五员”也均蒙照准。而司法行政部为上海地院的司法官加薪,也是在沈锡庆上任后由他申请而来的结果。^③

不可否认的是,沈氏能拿到高院以及司法行政部的经费,顺利对上海地院看守所进行改造扩建,这可能与上海地院本身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看守所的确存在问题也有关联。但是何以在司法经费紧张且并没有制度约束的情况下,对于下级的经费申请作出快速有效率和符合下级申请数额的反应,人际网络则在其间充当了重要的助推器。

法院的人事与经费活动,在制度之外,存有较为弹性的操作空间。而从以司法行政部为代表的官方发布的训令、制定的政策来看,无一不都是对于这个弹性的操作空间,即人际网络进行

① 《沈锡庆日记》第三册,1932 年 3 月 10 日,星期四。

② 参见《沈锡庆日记》第五册,1933 年 5 月 19 日,星期五。

③ 参见《地方法院法官加薪》,载《申报》1932 年 11 月 3 日,第 16 版。

义正言辞的抑制,^①这也从反面印证了司法界人际网络存在的真实性与广泛性。

〔五〕结语

法院的建制和运行,为近代司法建设的荦荦大端,明晰法院的历史,便能明晰近代司法的发展脉络。以具有中国特质的人际网络作为视角来考察近代新式法院的运作,可以发现新式法院的运作实际汇合了中西方在语言、知识、文化等各个层面的交融、冲突与争斗。新式法院的建造与运行的理念、制度架构等,皆属舶来之物;而活动于其中的人,则并未彻底走出家天下的旧体制,濡染于关系本位的文化氛围当中。沈锡庆的司法界人际网络,以及该人际网络在上海地方法院活动的隐现,为我们思考中国近代司法界外来思潮和固有文化的互动情状,提供了一个良好契机。

沈锡庆,作为法律人个体,终其一生,始终与司法有着不解之缘,并与整个国家的命运耦合于一起。近代中国危急存亡之秋,他与很多中国其他的学子一样,负笈东瀛或西洋,学习近代新式法政知识,以沾染法律新知的头脑,投身到中国近代的司法建设中来。他有司法救国的理想,对20世纪30年代司法界的种种恶习嗤之以鼻,期以上海地方法院为自己奋斗的立足点,从其所能努力之处,荡涤司法界的污垢。沈氏学习新式知识,借西方法律新知,建立起司法衡器的时代理想,统一于近代中国建设

① 参见《禁止奔竞请托案》,载《南京市政府公报》1932年第107期;《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整顿官常有关审判作风等问题训令》,上海市档案馆藏,Q181-1-1109;《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关于官规、任用、法官任用及回避事项(1932)》,上海市档案馆藏,Q181-1-85;等等。

现代民族国家的目标。但在历史的惯性中,中国传统的旧式资源,并未自然流逝消亡,而是仍附着在时代的脉络中,浸润在沈锡庆在内的过渡时代的法律人的身心理路上。他们有意无意的将中国所特有的关系本位式文化,渲染于司法界,便是其中一种重要的表现。这样一种外来思潮与固有文化的并存,贯穿于近代司法界的始终,一直持续到当下。

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在建设民族国家的进程中,对其中重要环节之司法制度的构建,一直是马不停蹄,即使在抗日战乱时期,也没有停下建制的脚步。所呈现的制度成果不可谓不丰盛。但为何,这样的法制成果并未带来显见的法治文明? 人际网络视野下的法治,为何呈现以人治方式追求法治效果的吊轨局面? 司法权威为何长期没能树立? 李启成曾以“制度器物化”^①的概念来指称近代以来中国司法建设的逻辑,即是他对上述问题原因的回应:

从条文上照搬、具体制度上模仿列强(尤其是日本),根本没有深入考察固有治道之得失,将传统官府归入行政范畴,在对传统官府略作变革之后,新建各级审判衙门,以经考试合格并略加培训的法官来行使司法权。这种完全没能借助固有资源来进行的制度建设,是近代中国司法权威难以有效确立的重要原因。^②

李启成的观点,实点出了原因“无”的一面、“制度”的一面,即未能充分借用固有治道之资源。笔者认为,原因还有“有”的

^① 制度器物化,即继受主体在继受制度时,长期沿袭了前一阶段学习器物的思维模式,即将制度当成一孤立的、静止的器物来看待,从而将制度物化。参见李启成:《法律继受中的“制度器物化”批判——以近代中国司法制度设计思路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② 李启成:《法律继受中的“制度器物化”批判——以近代中国司法制度设计思路为中心》,载《法学研究》2016年第2期。

一面、“人”的一面,即夹杂着中国传统关系本位文化的余绪,与近代新式的关系资源相结合,所形成的人际网络,有意无意地被裹挟进了时代的洪流中,充当了一种中国司法建设的无形壁垒。不仅司法界如此,整个法律界也如此。这种人际网络,犹如一个被赋予了魔力的磁场,当一些固态或固定的物质进入这个磁场后,都会被它异化与软化。当然这个结果是否全然是负面的,并不能妄断。